

關於書體、書風多樣化的一種試論——  
從漢代書跡中所見漢字擴大化和書寫省力化的傾向

The Diversification of Writing and Calligraphic Style:  
Trends of Handwriting Enlargement and Simplification during  
the Han Dynasty

尾川明穗

Ogawa, Akiho

筑波大學藝術系副教授

摘要

關於書體、書風變遷的主要原因，雖然有各種各樣的討論，但本文認為是由於字徑及其造型的變化所致，這一點主要從漢代遺物進行佐證。簡牘通常被書寫在比較狹窄的區域內，但由於大型木簡等書寫對象的擴大化，增加了寫大字的機會，並使用了短橫等，推測出逐漸實現了省力化。

暫不考慮這種狀況變化的應對，以往對硬筆和擴大臨書的指導有可能存在改善的餘地。

【關鍵詞】字大、書寫材料、簡牘、書體、書風

## 前言

在書法的歷史上，有著多種多樣的書體、書法風格，探尋其形成之主要原因的論述也有很多，例如杉村邦彥的《文字造型所展現出的時代性》，列舉了書寫材料、環境、精神等，說明了書法風格的原因。<sup>1</sup>我們也可以看到對個別具體對象的論及，例如關於楷書的產生，福田哲之推測是伴隨著紙的普及、進而書寫範圍的擴大化所致，<sup>2</sup>另外，還有關於王羲之書法的革新性，松村茂樹指出是因為大量使用了側鋒的原因所致<sup>3</sup>。

如上所述，特別的材料、書寫範圍、用筆方式等要素都是造成書體、書風變化的重要原因，但僅僅是這樣的話，想要闡明楷書成立的原因以及隸書遺跡中多種風格並存的理由等，恐怕是非常有困難的，為了觀察該要素的一部分，很有必要窺探產生用筆法、時代性、個性等差異的根本原因和作用的詳情。

這裏想要關注的是，為了對應字的大小（以下簡稱“字大”<sup>4</sup>）以及書寫範圍的擴大化而實行的造形上的舉措。

關於書寫範圍的變化，除了前文的福田先生以外，還有梁培先先生的專論，在刻符中沒有規定的字勢，另外甲骨文中涉及到縱長的字形，並推測後者的字形是由於竹簡的使用而產生的。此外還談及到關於隸變的原因，指出了竹簡到木簡書寫材料的變遷對其產生的影響。<sup>5</sup>雖然木簡的出現，確保了書寫幅面變寬，也可以看到書寫的多樣性成為可能，但是沒有考慮到在狹窄的竹簡上扁長書寫的楚文字、甲骨的脈絡等方面，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還有很多。

---

<sup>1</sup> 杉村邦彥《書苑彷徨》（二玄社，1981）所收。

<sup>2</sup> 福田氏擔當執筆〈書體史〉（墨編集部編《教えて先生！書のきほん》藝術新聞社，2011）。

<sup>3</sup> 松村氏「王羲之はなぜ「書聖」であり続けるのか？」（松村氏『書を探る』アートダイジェスト，2000）。

<sup>4</sup> 此處的同義詞是“字徑”，但為了區分日語裡同音的“字形”，故採用了“字大”這一表達。

<sup>5</sup> 梁培先〈竹簡、木簡、碑制“形”與“質”〉（中國書法院主編《簡帛書法研究》榮寶齋出版社，2009）所收。此外，下田章平〈懷素草書の二面性〉（《中國文化》第67號，2009）中指出，在紙拉門、牆面上出現了大字書寫的狂草，備受關注。

另外，關於字大，從文字教育的觀點，可以看到有考察初等教育中追求的字大的研究、<sup>6</sup>探討邊框線內適當的字大比例的論述等，<sup>7</sup>這些都是著眼於確保字的辨識度和書寫動作的理解、掌握上，因此在正確的識字方面是有效的，但是對於手部的細微運動沒有考察，特別是在強調書法的藝術層面或從“樣式論”上進行考察時，更有必要探討與書寫運動間的關係。

本文中，確認了作為經典且被尊重的書法遺跡在什麼樣的書寫狀況、又是用什麼樣的“字大”進行書寫，重新考察自然的書寫應有的狀態和後來增加的造型方法。具體地說，注目於漢代隸書碑刻中書法風格的展開，以及漢末楷書的產生，特別是通過觀察和解析簡牘、碑面利用情況及其字幅來推進。書寫比平時大的字時，往往進行了“不合理”的書寫，在這種過程中導致了新的字體和書法風格的產生。

第一部分，聚焦於漢碑和西漢以前的簡牘。確認了兩者間字形大小的差距，以及如今被尊為經典的主要刻石中的字並非日常書寫的大小。同時也想確認，讓人聯想到簡牘墨蹟的書風在碑刻上出現需要一段時間這件事。

第二部分，首先，確認了《鮮于璜碑》碑陽、碑陰間書風的差異與字大相關。進而根據字大、字形將漢代隸書碑刻分類為四組，區別最初的書法以及變化後出現的書法。注意到如何填滿相異與簡牘的寬廣的碑面，通過這樣的方法引導兩種書法風格的產生。

第三部分，通過可以窺見楷書最初面貌的東牌樓漢簡，在確認了該簡牘的書法之後，考察從隸書到楷書演變的主要原因。確認了在較寬的木簡上書寫伴隨而來字大的擴大，與楷書形成有著重要聯繫的可能性，同時還想指出運用帶有細微右回旋筆法的短畫來達到省力化的可能性。

---

<sup>6</sup> 關於初等階段的學習中的字大，歷來有很多討論，關於這一經過，清水文博〈硬筆學習における文字の大字化の考察〉(《書寫書道教育研究》第24號，2009)一文中詳細說明。

<sup>7</sup> 押木秀樹等人〈柁内書字における漢字の大きさの統一感に関わる要素〉(《書寫書道教育研究》第20號，2005)。

## 一、東漢中葉以前的簡牘、碑刻中字形大小的差距

在漢碑之中可以看到有雄渾的《張遷碑》，華美的《曹全碑》等各種各樣的書風。關於有一部分漢碑的書風，西林昭一曾指出與漢代簡牘書風近似，如下所列。<sup>8</sup>

①居延出土《初元三年簡》（西元前 46 年）與《肥城畫像石墓題記》（83 年）

②定縣前漢簡（前 53 年）和《史晨碑》（169 年）、《熹平石經》（183 年）《曹全碑·碑陽》（185 年）

③《蒼山畫像石題記》（151 年）《曹全碑·碑陰》（185 年）

此外，對於這樣的分析，澤田雅弘有如下闡釋：

到了東漢晚期，也有著一種正統的隸書樣式意識，在這一樣式的基礎上，也不能把所有的石刻隸書整體統一起來，與正統樣式同時存在著的其他各種樣式在流行、用途和自然趨勢中興衰起伏，（那些樣式組成的不同）脈流經過了很長時間而被繼承下來。也就是說，《曹全碑·碑陰》被認為是繼承了與《蒼山畫像石墓題記》同樣的書風，《鮮于璜碑·碑陰》與《張遷碑》的隸書也繼承了同樣的書風。<sup>9</sup>

這個見解雖然可以被肯定，但是我們要注意的是，上面提到的①②中都有墨蹟先於碑刻出現的情況。另外，②關於《史晨碑》等刻石的字形大小看起來恐怕是《定縣西漢簡》的兩倍以上，所以我們認為有可能同種書風實現擴大化書寫（即字寫大）可能需要一些時間。鑒於①中的字大感覺不到太大的差異，雖然可以認為是碑面書丹行為本身有一定困難的因素，但是如果考慮到碑成立年的時間差，便可推測出由於碑面利用的差異對字大的變化產生的影響很大。

<sup>8</sup> 西林氏《書の文化史》上（二玄社，1991）。

<sup>9</sup> 澤田氏〈張遷碑の志向したもの〉（《中國法書ガイド》9 張遷碑，二玄社，1990）。

本部分，聚焦於後文提到的東牌樓漢簡以前的簡牘以及兩漢隸書石刻的字大，並確認這兩者間（字大）的差異。

首先關於簡牘。這裏，我想在橫田恭三先生的指引下確認東漢中葉以前的簡牘的尺寸，並試作整理（如表 1）。可以看出，除了牘、楊等幅面較寬的部分，簡的寬度一般在 1.3 釐米之下，這大概是因為竹子的幹徑比木頭更細的緣故吧。能看到比這更寬的東西，主要是木牘以及西域的木簡。木牘的遺跡比較少，而且大多是多行書寫，大字並不多見。雖然西域木簡被認為是由於乾燥地帶不適合竹子的生長而被使用的，<sup>10</sup>但其寬度被認為是配合竹簡而製作成細的。<sup>11</sup>另一方面，想確認關於隸書碑刻的字大。根據被認為是原版尺寸印刷的圖版，測量了最寬橫畫的長度（如表 2）。可以確認的是，儘管在日常生活中（簡牘墨蹟），書寫的寬度不超過 1 釐米，但在碑面上至少以兩倍以上的大小進行書寫。

秦代就已有《泰山刻石》，說明篆書也曾面臨同樣的狀況，但像這樣在字大差異巨大的情況下，漢碑的書法又會怎樣發展呢？下一部分就來看看書風與碑面利用、字大之間的關係。

---

<sup>10</sup> 原宗子〈簡牘素材の樹種初探〉（《日本秦漢史學會會報》第 2 號，2001）中對西域簡牘材料進行了考察，但幾乎沒有提及竹簡。

<sup>11</sup> 《木簡殘紙集 1》（書跡名品叢刊 108，二玄社，1963）的伏見沖敬氏解說，“‘簡’字如其字所示，原本是竹制的，（中略）後來，更多地使用了比竹子更容易加工的木片，但依然呈現出細長的形狀，這大概是直接衝擊了竹簡的形制吧。”本文將遵循伏見先生的見解。

(表 1) 古代簡牘寬度

※按照成立時期順序。摘自橫田恭三《中國古代簡牘のすべて》(二玄社, 2012)。含有具體年代不明的遺品的簡牘群、西晉簡以及沒有記載寬度的簡牘均被省略。

成立時期	出土地	名稱	材質・形態	簡牘的寬度(可確認的大致行數)
戰國早期	湖北省	曾侯乙墓竹簡	竹簡	竹簡約 1.0cm
戰國中期	湖北省	天星觀楚簡	竹簡	竹簡 0.5~0.8cm
戰國中期	湖北省	郭店楚簡	竹簡	竹簡 0.45~0.65cm
戰國中期	河南省	信陽楚簡	竹簡	竹簡 0.5~0.9cm
戰國中期	河南省	新蔡葛陵楚簡	竹簡	竹簡 0.6~1.2cm
戰國中期前半	湖南省	慈利楚簡	竹簡	竹簡 0.4~0.7cm
戰國中晚期	湖北省	九店楚簡	竹簡	竹簡 0.6~0.8cm
戰國中晚期	湖南省	夕陽坡楚簡	竹簡	竹簡 1.1cm
戰國秦晚期	四川省	青川秦木牘	木牘	木牘 3.5cm (3 行)
前 316	湖北省	包山楚簡	竹簡・竹牘	竹簡 0.6~1.0cm
戰國中期後半	湖北省	望山楚簡	竹簡	竹簡 1.0cm
戰國中期後半	湖南省	仰天湖楚簡(25 號墓)	竹簡	竹簡 0.9~1.1cm
戰國晚期	甘肅省	天水放馬灘秦簡	大概是竹簡	竹簡 0.7cm
戰國晚期	不詳	上海博物館楚簡	竹簡	竹簡 0.6cm
前 278~秦統一	湖北省	王家台秦簡	竹簡・竹牘	竹簡 0.7cm~1.1cm、竹牘 4.0cm
前 233 左右	湖北省	睡虎地秦木牘(4 號墓)	木牘	木牘 2.8~3.7cm
秦代	湖北省	睡虎地秦簡(11 號墓)	竹簡	竹簡 0.3~0.7cm
秦代	湖北省	龍崗秦簡	竹簡・木牘	竹簡 0.5~0.7cm、木牘 3.2cm (2 行)
秦代	湖南省	裡耶秦簡(1 號古井)	竹簡・木牘	木牘 1.4~8.5cm (6 行)
秦代	不詳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秦簡	竹簡	竹簡 0.5~0.8cm
前 209 以後	湖北省	周家台秦簡	竹簡・木牘	竹簡 0.4~1.0cm、木牘 4.4cm
前漢	湖北省	鳳凰山前漢簡(8、9、10 號墓)	竹簡・木牘	竹簡 0.55~2.9cm、木牘 3.8~4.9cm (8 行)
前漢早期	湖北省	孔家坡前漢簡(8 號墓)	竹簡・木牘	竹簡 0.5~0.9cm、木牘 3.5~5.5cm
前漢早期	廣西壯族自治區	羅泊灣前漢簡	木簡・木牘	木牘 4.9~5.7cm (10 行)
前漢文帝期~景帝期	湖南省	長沙王后「漁陽」前漢簡	木牘	木牘 4.3~6.2cm (8 行)
前 186 以後	湖北省	張家山前漢簡(247 號墓)	竹簡	竹簡(算數書) 0.7cm
前 183	湖北省	謝家橋前漢簡	竹簡・竹牘	竹簡 0.45~0.75cm、竹牘 2.8~2.85cm (4 行)
前漢早期後半	山東省	銀雀山前漢簡	竹簡・木牘	竹簡 0.5~1.0cm、木牘 4.3~4.6cm
前 179~前 141	湖北省	鳳凰山前漢簡(167 號墓)	木簡・木牘	木簡・木牘 1.0~1.5cm
前 179~前 141	湖北省	蕭家草場前漢簡(26 號墓)	竹簡	竹簡 0.6~0.9cm
前 171	廣東省	南越國宮署前漢簡	木簡	木簡 1.7~2.4cm
前 173 以後	湖北省	高臺前漢簡(18 號墓)	木牘	木牘 3.15cm~5.57cm (6 行)
前 168	湖南省	馬王堆前漢簡(3 號墓)	竹簡・木牘・木牘	竹簡 0.6~1.2cm、木牘 2.5~2.6cm (2 行)

成立時期	出土地	名稱	材質・形態	簡牘的寬度（可確認的大致行數）
前 167	湖北省	鳳凰山前漢簡（168 號墓）	竹簡・竹牘	竹簡 0.7~0.9cm、竹牘 4.1~4.4cm （8 行）
前 165 左右	湖南省	馬王堆前漢簡（1 號墓）	竹簡・木牘	竹簡 0.7cm
前 165~前 164	安徽省	阜陽前漢簡	竹簡・木牘	竹簡 0.5cm、木牘 5.5cm（8 行）
前 162	湖南省	虎溪山前漢簡	竹簡	竹簡 0.6~0.7cm
前 157 以後	湖北省	睡虎地秦簡（77 號墓）	竹簡・竹牘・ 木牘	竹簡 0.4~0.6cm（木牘 7 行）
前 155 以後	湖北省	印臺前漢簡	竹簡・竹牘・ 木牘	竹簡 0.45~0.75cm、竹牘 2.8~ 2.85cm
不明（前漢武帝期以 後）	甘肅省	永昌水泉子漢簡	木簡	木簡 1.4~1.8cm
前漢（武帝期前半）	湖北省	松柏前漢簡	木簡・木牘	木簡 1.3~1.4cm、木牘 2.7~6.5cm （11 行）
前漢武帝期早期	湖南省	走馬樓前漢簡（8 號古井）	竹簡・木簡？	竹簡 0.8~0.9cm、兩行 1.8~2.1cm
前漢中期	不詳	北京大學前漢簡	竹簡	竹簡 0.7~1.0cm
前漢中晚期~王莽新 朝	陝西省	未央宮漢簡	木簡	木簡 1.0~1.3cm
前 117~前 54	江蘇省	胡場前漢簡	木牘・木牘	木牘 3.5~3.7cm（6 行）
前 117 以後	安徽省	天長前漢簡	木牘	木牘 3.6~6.9cm（6 行）
前 111~21	甘肅省	敦煌懸泉置漢簡	大概是木簡 ・木牘	木簡 0.6~1.2cm、兩行 2.0cm
前 87	山東省	日照海曲前漢簡	竹簡・木牘	竹簡 0.6cm、木牘 7.3~7.6cm
前 71~21	甘肅省	敦煌馬圈灣前漢・王莽新簡	大概是木簡	木簡 0.8cm
前漢晚期	江蘇省	儀徵胥浦前漢簡	竹簡・木牘	竹簡 0.9~1.9cm、木牘 3.0~7.5cm
前 55	河北省	定州前漢簡	竹簡	竹簡 0.7~0.8cm
前 10	甘肅省	武威磨嘴子徵集漢簡	木簡	木簡 0.9~1.1cm
前 10	江蘇省	尹灣前漢墓簡牘	竹簡・木牘	竹簡 0.3~1.0cm、木牘 6.0~9.0cm （21 行）
後漢	甘肅省	武威磨嘴子「儀禮」王莽新後 漢簡	木簡	木簡 0.8~1.0cm、短簡 1.5cm
後漢	湖南省	張家界古人堤後漢簡	木簡・木牘	木簡 2.6~3.0cm（3 行、特殊情況 6.5cm）
後漢初期	甘肅省	武威旱灘坡後漢「武威醫簡」	木簡・木牘	木簡 0.5~1.0、木牘 1.1~4.0cm（3 行）
43	甘肅省	武威旱灘坡後漢簡	木簡	木簡 1.0~1.1cm
72	甘肅省	武威磨嘴子「王杖十簡」	木簡	木簡 1.0cm
168~189	湖南省	東牌樓後漢簡（7 號古井）	木簡・木牘	木簡 1.0~2.0cm、木牘 2.2~6.3cm
漢末~三國吳	湖南省	郴州蘇仙橋吳簡	木簡	木簡 1.4~2.1cm
232~238	江西省	高禰墓吳簡	木製刺・木牘	刺 3.5cm、木牘 9.4cm（11 行）

(表 2) 漢碑中隸書的字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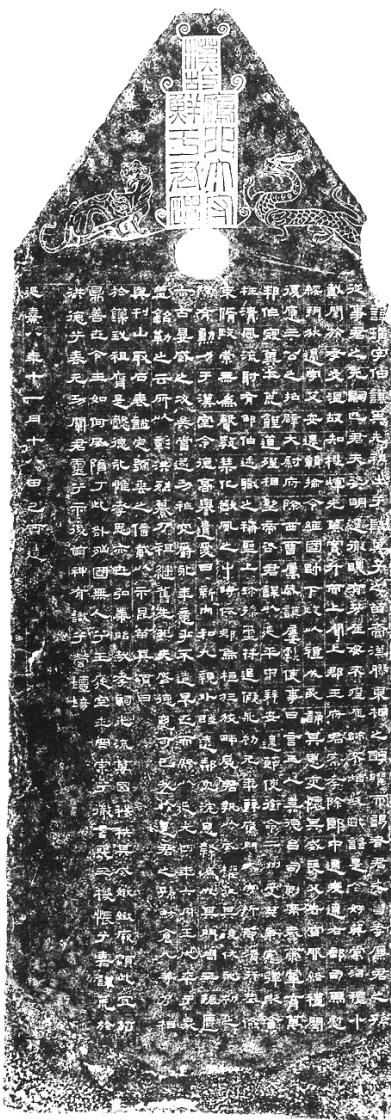
※到 147 年為止。摘自徐玉立主編《漢碑全集》(河南美術出版社, 2006)。此書收錄了很多拓本的影印資料, 但沒有顯示比例尺。通過其他影印資料用網格尺的方式進行了實寸測量。

成立年	名稱	所在地	最大字幅	成立年	名稱	所在地	最大字幅
前 68	巴州楊量買山地記	四川	8.5cm	106	陽三老石堂畫像石題記	山東	1.0cm
36?	侍御史李公闕	四川	9.0cm	110	建初四年畫像石題記	安徽	10.0cm
52	三老諱字忌日刻石	浙江	3.0cm	118	嵩山太室石闕銘	河南	3.5cm
57	何君閣道銘	四川	9.5cm	118	青神大墓坳元初五年崖墓題記	四川	12.0cm
61	泰山蕭壩永平元年崖墓題記	四川	13.0cm	123	嵩山少室石闕題名	河南	6.0cm
63	開通褒斜道摩崖刻石	陝西	18.0cm	125	延光四年殘碑	不明	6.0cm
74	楊德安墓石題記	江蘇	7.5cm	128	石門關銘	四川	12.0cm
76	大吉買山地券摩崖刻石	浙江	17.0cm	128	王孝測碑	(四川)	5.0cm
76	青神大墓坳建初元年崖墓題記	四川	29.0cm	130	永建五年食堂畫像石題記	山東	3.0cm
77	侍廷裡父老僱買田約束石券	河南	2.5cm	133	南川陽嘉二年崖墓題記	四川	19.5cm
81	司馬長元石門題記	山東	17.0cm	133	陽嘉殘碑	山東	4.5cm
83	張文思為父造石闕題記	山東	3.5cm	134	樂山虎頭灣陽嘉三年崖墓題記	四川	21.0cm
85	孫仲陽為父建石闕題記	山東	10.0cm	135	四川陽嘉四年崖墓題記	四川	9.0cm
86	徐州銅山元和三年畫像石題記	江蘇	3.0cm	136	樂山蕭壩永和一年崖墓題記	四川	8.5cm
86	南武陽皇聖卿闕銘記	山東	3.0cm	136	微山永和元年食堂畫像石題記	山東	4.5cm
87	南武陽功曹闕銘記	山東	2.0cm	137	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	新疆	6.0cm
89	路公食堂畫像石題記	山東	2.5cm	137	微山永和二年畫像石題記	山東	2.5cm
92	公乘田魴畫像石墓題記	陝西	4.0cm	140	沙南侯碑	新疆	10.0cm
94	成都永元六年闕題記	四川	7.5cm	141	微山桓壽食堂畫像石題記	山東	2.0cm
98	張仲有修通利水大道刻石	河南	3.0cm	141	冀州從事馮君碑	河南	3.5cm
98	滕州永元十年畫像石題記	山東	2.0cm	142	會仙友題刻	四川	10.0cm
84-101	濟寧任城王墓黃腸石	山東	14.0cm	143	北海相景君碑	山東	4.5cm
101	諸掾造塚刻石	山東	4.0cm	144	莒州宋伯望買田刻石	山東	6.0cm
105	兗州刺史洛陽令王稚子闕	四川	18.5cm	144	文叔陽食堂畫像石題記	山東	10.0cm
106	田文成畫像石墓題記	陝西	3.0cm	146	三公山神碑	河北	6.5cm
106	賈武仲妻馬姜墓記	河南	3.5cm	147	敦煌長史武斑碑	(山東)	2.5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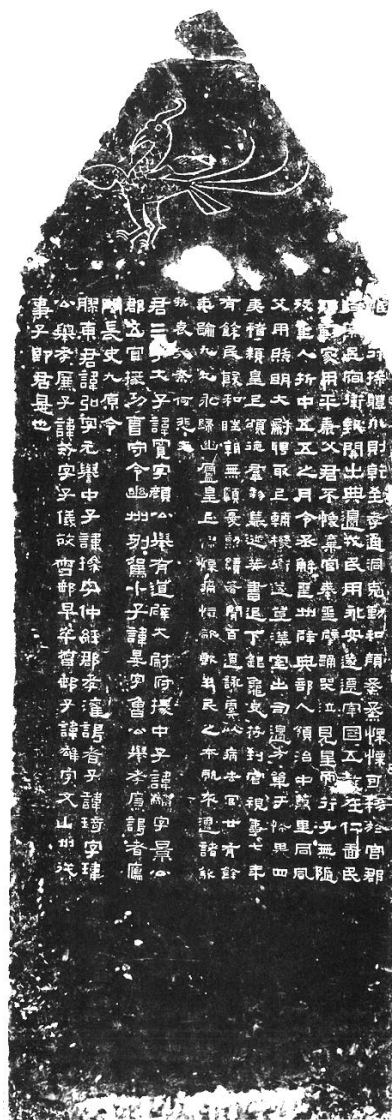


## 二、漢碑的書風和碑面利用的關係

漢碑之中，碑陽和碑陰的書風各不相同，因《鮮於璜碑》(165年)(如圖1)，是其中一例，因此也備受關注。根據前述澤田先生指出，“《鮮於璜碑·碑陰》(如圖2)和《張遷碑》(186年)都是以同樣的樣式為目標”。西林先生作了如下論述，設定兩碑是一脈相承的。



(圖1)《鮮於璜碑·碑陽》  
(縱 228.0cm)



(圖2)《鮮於璜碑·碑陰》

寫出與《張遷碑》書風極為接近的《鮮于璜碑》碑陰的書法、與《張壽殘碑》(167年)相近的《鮮于璜碑》碑陽書法的書者，可以說是另一種無拘無束的姿態吧。如此看來，與碑陰同種書風的《張遷碑》中是否也蘊含著《鮮於

璜碑》碑陽的技法和感覺呢？（中略）值得注意的是，《鮮於璜碑》、山東的《張壽殘碑》、《衡方碑》、《營陵置社碑》、《張遷碑》，以上東漢末期同一脈流的多樣化。<sup>12</sup>

西林先生通過對被稱為“知性的八分書”的《禮器碑》、《乙瑛碑》、《曹全碑》書法風格進行比較，認為這些書法一脈相承，但關於發現時間和理由並沒有說明。前面提到澤田先生指出《鮮於璜碑》碑陰與碑陽的書法風格不同：①碑陰開頭的字較大②碑陰的書風並不統一③碑陰採用方形的字體，並指出其中的原因，如下：

字形的大小（和用筆的關係），雖有可能是形成兩者差異的原因之一，但根本上來說，這意味著書者對待碑陽和碑陰的書寫理念不同。（中略），使人聯想到不成熟或者說（與碑陽相比）衰退的碑陰字，其實是書寫者區別於碑陽而選擇的一種樣式，並不歸結於書寫不熟練的手腕和隸法衰退的緣故。

只是，如果考慮到碑陰 319 字，碑陽 508 字，這種字數差異的話，可以認為這種字數差異是比澤田先生的設想更為重要的因素。為了澤田先生當時被認識到的漢碑的各個樣式，對於簡牘和大小各異的書寫範圍，是否應該從如何有效書寫的角度進行分類呢？

在本部分，將確認碑面利用的方式對書法風格有影響的可能性。另外，我想一提的是在那之後書法的省力化得以實現，產生了“知性的八分書”。

下面，我將漢代隸書碑刻按照點畫的密度、佈局、字體形狀、字體大小分為四種。另外，關於各組的遺例，列舉了年代較早的例子。另外 A、C、D 這三組在處理如何書寫大字這一問題上是共通的，特別是 A、C 之間，根據線條的形狀和字大統一的程度來判斷介乎於兩者之間的東西。由於篇幅的關係，每組只刊登了一部分的圖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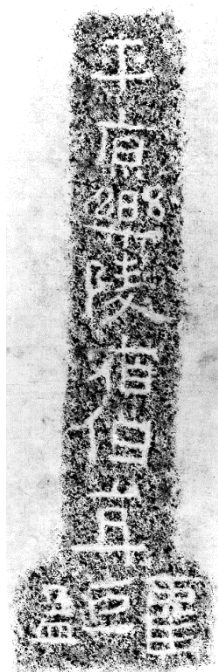
A 組《霍去病刻石》（前 117 年以後）（圖 3）、《楊量買山記》（前 68 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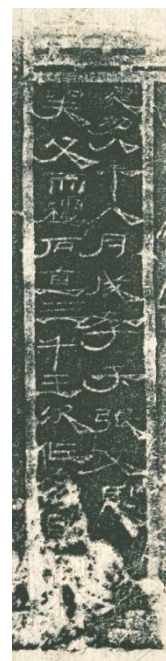
<sup>12</sup> 西林昭一〈中國法書ガイド 張遷碑〉（前掲注 9 所收）。

《魯孝王刻石》(前 56 年)、《蒼山畫像題記》(51 年)等，這組都是用超過簡牘的字大進行書寫的，字的形狀和大小不受橫畫的多寡、長豎畫的有無所左右。也許是出於廣泛使用碑面的意識，豎長的字也大量存在。<sup>13</sup>雖然點畫受到刻制的影響，但刻制時草率的拉線或已與墨蹟相差甚遠。在許多情況下，字裏行間幾乎沒有太多的間距。

B 組《肥城畫像石墓題記》(85 年)(圖 4)、《微山永和二年畫像石題記》(137 年)等，用接近簡牘墨蹟中的字大、書風進行書寫。大概可以看出畫像石的題記等字形寫得比較小。



(圖 3)《霍去病墓刻石》  
(縱 72.3 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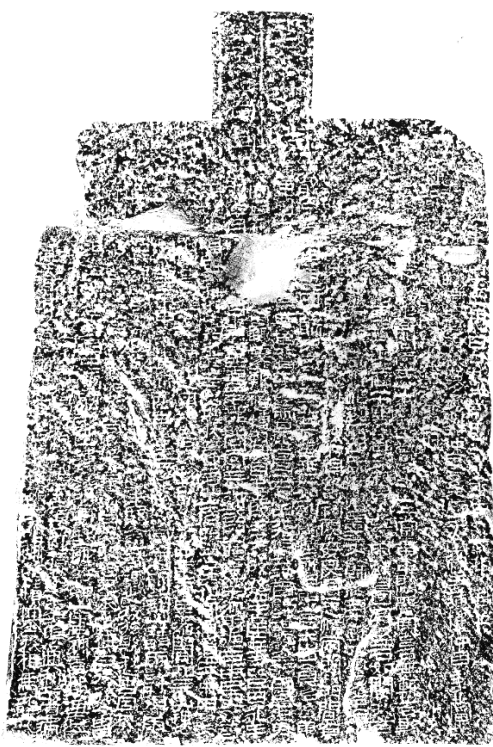
(圖 4)《肥城畫像石墓題記》  
(縱約 21.0 cm)

C 組《無極山碑》(67 年)(圖 5)、《侍廷裏父老憚買田約束地券》(77 年)、《裴岑紀功碑》(137 年)、《北海相景君碑》(143 年)等，這組都是用超過簡牘的字大進行書寫。運用了直線，且出現了比較多水平、垂直的筆畫。雖然受到刻制的影響，但能看到棱角分明的起筆、轉折。與 A 組相比，字的形狀較統一，接近方形的情况也比較多。字內留白處均勻分佈，將其排列成適合方格的字形。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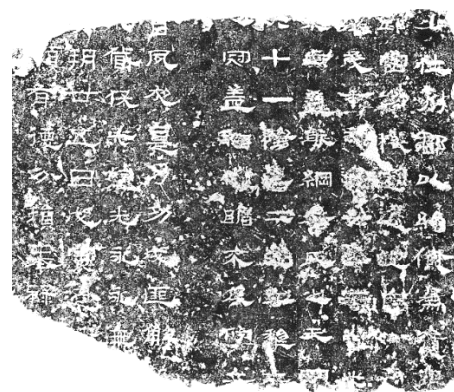
<sup>13</sup> 在書法的教科書、概說書中，把隸書、八分的特徵解釋為橫長的字形的文章有很多，但是這在考究書體史方面應該慎重研究。

於字的間距，各書跡各不相同，但全篇流暢，給人以整齊的印象，而後也出現了橫向整齊排列的現象。

D組《延光四年殘碑》（125年）、《陽嘉殘碑》（133年）（圖6）、《會仙友題刻》（142年）《石門頌》（148年）、《乙瑛碑》（153年）等，這一組相當於西林先生所稱的“知性的八分書”。用超過簡牘的字大書寫。可以窺見與墨蹟一樣的粗細變化和流暢的曲線，以及幅度稍大的波磔。為了使筆畫間的密度均勻，將點畫放在一邊，通過長橫畫和撇畫來取得均衡。字形基本都以扁長型統一。其中多數以行對齊，橫向排列整齊，且字間距比C組作品寬。



（圖5）《無極山碑》  
（縱 155.6 cm）



（圖6）《陽嘉殘碑·碑陽》  
（縱 42.3 cm）

A組是現存的隸書石刻中最早出現的書風，並且這種書風此後也一直被後人延續。B組的遺跡較少。在經常使用寬度為1.3釐米以下的簡牘的情況下，A、B兩組被認為是自然產生的書風（對應上文最初的說法，與C、D組變化後出現的書法相對）。A組為了對應書寫範圍比起簡牘絕對性擴大的情況，據推測，這是書寫者以自己的方式再現簡牘的書風以及填滿碑面這兩個目的互相配合的結果。

C 組出現在東漢前半葉，大約是西元 70 年，D 組出現在東漢後半葉，可以確認大約是西元 150 年以後的遺跡。C 組是考慮到如何將長篇文章擴大書寫的結果。可以想像，以一定的格調書寫長線條是需要慎重的。另外，雖然可以將 D 組看作是 C 組向前推進了一步的結果，但是考慮到 B 組的存在，可以想像到，D 組的產生是因為（在 B 的基礎上）運用了短的筆畫來實現書寫的省力化，其次，通過改變用筆方式，將簡牘上舒張的八分擴大書寫。C、D 雖然後來並存，但是考慮到權威性和可讀性，在寫滿碑面的情況下，多取 C；書寫摩崖等大字或以省力化為目的的情況下，多取 D。有些形式難以根據其字形和條線進行分類，這恐怕是 C 定型化後，以各種各樣的體裁和字大被書寫的影響。

綜上所述，為了應對寬大碑面的長篇文字書寫，出現了 C；而後產生了僅將主筆拉長以確保字的平穩性的 D。這可以歸結為在文字的擴大化後，實現省力化的過程。

另外關於 D 組的產生，雖然有必要考慮到建碑頌德的興盛而帶來技法水準的提高，<sup>14</sup>但從既已存在的《泰山刻石》、《袁安碑》等精刻來看，刻工水準對書風的影響是有限的。倒不如說，除了上述的因素之外，已經沒有必要通過行間距和字間距來統一各字的分界和字形，同時可以想像到，寬大的碑面使得壓迫感大大喪失。

### 三、楷書的誕生與木質簡牘的增加、擴大化的關係

2004 年出土的東牌樓漢簡（168—189 年），因能窺見楷書成立的真相而備受關注，在書報上可以看到劉濤先生的見解。繼而又有橫田恭三先生的介紹，都對本文的考察研究給予了重要指導，詳見下文。<sup>15</sup>

<sup>14</sup> 井垣清明等人編《書の総合事典》（柏書房，2010）土屋文明擔當執筆〈楷書〉。此外，在前揭注 5 梁培先的論考中也有提及。

<sup>15</sup> 劉濤〈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所見書體及書法史料價值〉（《文物》2005 年 12 期），劉氏〈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的書體·書法與書寫者〉（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編《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文物出版社，2006），橫田恭三〈楷書の発生—東牌樓出土簡牘からみた後漢晩期の楷書書法〉（《全國大學書道學會紀要 平成 18 年度》，2006）。

(1) 因為行書和楷書都存在連續的線條，而且存在點畫的省略與並寫，所以很難區分。另外，像這樣分類困難的書跡可以被分為①介於俗筆隸書（因快速書寫，而使波磔省略的隸書）和早期楷書之間的書體、②俗筆隸書和早期的行書，或者說介於早期的楷書和早期的行書之間的書體。

(2) 之所以存在這樣的中間書體，是因為書者沒有意識該用哪一種書體進行書寫。

(3) 頓筆（咚地停下來的筆畫）、按筆（把筆停下來往下壓）是楷書的特徵，根據其有無，便可區別隸楷二體。

(4) 行書的特徵是筆畫的縮短。

另外，橫田先生又在劉濤先生的見解基礎上，做出了如下闡述：<sup>16</sup>

(1) 可以設想楷書有兩個階段，①能看到細微頓、按的萌芽期的楷書；②可以看到明確頓、按的定型的楷書（用筆沉著，有稜角的轉折），這兩個階段應該分開而論。

(2) 頓、按的產生是為了更好地進入下一個筆畫。

(3) 根據用筆、運筆的節奏和速度、文字的大小等，形成了俗筆隸書；也因快速書寫產生了連筆，從而形成了早期的行書。

(4) 楷書的運筆速度比行書稍慢，給人一種安靜的感覺。

此外，大橋修一從《東牌樓漢簡》第 32 簡中找到了重心偏上的“得”等字，這與鐘繇（151—230）《薦季直表》的感覺近似。<sup>17</sup>

各書體的分類和認定，是根據如何將點畫的形狀計量化等問題若發生變化，因此需確認階段性的差異。但是，劉先生（4）、橫田先生（2）—（4）、大橋先生關注的①橫畫的縮短②運筆速度③字大④重心的高低，這些內容被認為表示行

<sup>16</sup> 前揭注 15 橫田恭三的論考、橫田恭三《中國古代簡牘のすべて》（二玄社，2012）。

<sup>17</sup> 大橋修一〈鍾繇書の実相—新出の東牌樓後漢簡牘を手がかりとして—〉（《書法漢學研究》第 4 號，2009）。

書與楷書的成立有關而受到關注。<sup>18</sup>

本部分主要著眼於這四點，在此之前，再次確認在第一部分所涉及到的簡牘的寬幅。儘管東牌樓漢簡被發現與曾出土了很多楚簡和西漢竹簡的湖南省長沙市，但單行也寫在了寬 1.0~2.0 釐米以上的木簡、木牘上。由於大字的經常性使用，此處想探討為了實現書寫的省力化而使用短橫畫的可能性。

首先，關於決定簡牘寬幅的材質，富谷至先生對作為書寫材料的竹簡和木簡的區別做出了如下闡釋，指出等同於現代紙張的就是竹簡。<sup>19</sup>

竹簡是以編綴成冊的形式被使用的書寫材料，而木簡是作為單簡，在簡側刻齒，將簡的頭部做成圓形，並且開孔，在這樣的形狀基礎上被使用的。

但是，除了由於乾燥竹子難以生長的西域以外，如前所述，有必要考慮到單行木簡在長沙的使用。由於在長沙可以確認單行木簡之後使用木簡的例子，如走馬樓三國吳簡等，因此可以推測，至少在東漢末期富谷先生指出的區別是不存在的。<sup>20</sup>

---

<sup>18</sup> 在楷書成立的研究中、除此之外還存在爭議。從來傾向於根據西川寧先生提倡的有無三過折來區分隸、楷。北川博邦〈楷書字體の定著〉(《大東書學》第3號, 2003)指出、楷書的特徵是趯法、戈法的存在, 他說:“這種趯法、戈法, 是繼承與行書的, 楷書也可以成為行書整齊嚴謹者的旁證之一。”在觀察行書用筆的影響這一點上,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在東牌樓漢簡以前的武威醫簡(東漢初期)等作品中, 也能看到很多與趯法、戈法相近的線, 僅憑這一鉤畫很難將其視為楷書成立的主要原因。佐野光一編《木簡字典》(雄山閣出版, 1985)“寸”“戊”字參照。此外、近年姚宇亮〈漢簡中所見隸書的風格演化與分期〉(前掲注5所收)注目於馬圈灣漢簡(2年)的字例“五”“煌”, 講述了從左上往右下切入的起筆, 以及隨著波磔的消失而停止的動作變化, 並以敦煌出土的〈元和4年〉簡(87年)等為例指出之後更強的“楷化”。但是, 這也有很多以寫在簽牌上的大字為中心的例子, 僅以起筆、收筆的形狀來說明楷書的變化是很困難的。

<sup>19</sup> 富谷氏《木簡・竹簡の語る中國古代—書記の文化史》(岩波書店, 2003)第3章〈木簡と竹簡〉。

<sup>20</sup> 另外、陶安あんど〈書寫材料とモノの挾間—日本木簡學との比較を通じてみた中國簡牘學のジレンマ—〉(初山明、佐藤信編《文物と遺物の境界—中國出土簡牘史料の生態的研究—》六一書房, 2011), 如下所示與富谷先生有不同的見解。值得注意的是, 陶安先生指出根據使用

其次，關於簡牘的寬幅（如表 1）。如前所述，西漢以前的竹簡，寬度一般不超過 1.3 釐米。通過東牌樓漢簡和吳簡等東漢以後的簡牘，可以確認木簡、木牘的使用在增加，也比之前的更寬。西漢以前的木制簡牘中，遺例比竹簡更少，而且多為書寫 6~8 行的書跡，利用其寬度進行大幅書寫的例子很少。如後所述，在東牌樓漢簡中，隨處可見比以往更大的字，這可以想像是由於更長的木制簡牘逐漸得以大量生產的緣故。

當日常在更大範圍內書寫時，能夠發現比以往的字寫得大的機會也增加了，由此產生書寫長畫的必要性。雖然也有如實地寫了長畫的可能，但如果考慮到第二部分中所提及的“省力化”現象，此處則難以解釋。為了證實這一點，本文將對橫畫較短的隸書簡進行比較和研究。由於篇幅的關係，只列舉出其中的三件，分別是 A 居延出土《甲渠侯官文書》（前 62 年）（圖 7），B 武威出土《王杖十簡》（72 年）（圖 8），以及被劉濤先生列為早期楷書形態的東牌樓漢簡第 35 簡（圖 9）。

---

目的區分木、竹的說法很難成立，備受矚目。

在木簡的情況下，興起的實用意義難以說明，而在竹子的情況下（鳳凰山 168 墓、謝家橋 1 號墓“竹書”一撰稿人注）則很容易理解。因為竹子是圓筒形的，所以為了製作寬幅的書寫面，無論如何也只能製作多圓錐。（中略）看著謝家橋的“竹簡”，甚至可以想像，竹簡（或竹牘）比木簡更像是「兩行」的本來面目。（中略）確實，古籍的書寫材料中竹子偏多，但要斷言木和竹子分別不使用於編綴簡和單獨簡的話，還不得不說為時尚早。





(圖7) 居延出土  
《甲渠候官文書》(原寸)



(圖8) 武威出土  
《王杖十簡》(部分原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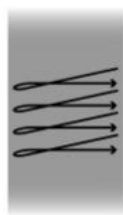


(圖9) 東牌樓漢簡  
第35簡(部分原寸)

以上三件的共同特徵是右斜的橫畫、一筆到位的橫折、左上角切入的起筆、感覺不到波磔之勢的收筆，這些都是快速書寫的結果。另一方面，注意到前述①～④的特徵，只有東牌樓漢簡是不同的，具體如下所示。①關於橫畫的縮短，A、B 簡中能夠看到，一字之中橫畫的長度沒有太大的變化，排布也很緊密。東牌樓漢簡則使用了很多的短筆畫，並相應地將偏旁等各部分互相分離，在字中留白等；②運筆速度，由於使用緩和的曲線和長畫線條，所以可以想像東牌樓漢簡的書寫速度之快；③關於“字大”，東牌樓漢簡的字是很大的，只是劉先生和橫田先生都認為是早期楷書第 12 簡，字幅約為 0.5 釐米，下文將會講述該注意的地方；④關於重心的高度，A、B 兩簡都是根據主要橫畫的位置而上下移動，但東牌樓漢簡中字的重心大多在字的上部，即便也有例外，但上部的橫畫一邊寫得較長，呈現出頭重腳輕的字形。

東牌樓漢簡之所以能表現出楷書的風格，是因為上述特徵中，字中留白的靈活運用以及重心的高度。雖然這和行書是相通的，但是增加了頓筆和、按筆，使其更接近於我們印象中具有“三過折”的楷書。

東牌樓漢簡具有這些特徵的主要原因，推測是與簡的寬幅擴大有關。



左



右

如果左手拿著像 A、B 那樣細的簡進行書寫的話，以右手手腕根部為支點，通過左右運動進行書寫，可以想像，在橫畫的右端，如上圖（左）那樣用力水平地甩出。但是在較寬的簡牘內書寫大字時，就有必要在這個動作的基礎上，以右手食指為中心各個手指關節深度彎曲。這樣一來，比起東牌樓漢簡中的左右往復運動，更像以類似行草書的右回轉動作為基調（如上圖右所示）。換而言之，回旋越小書寫速度越快，即為了實現省力化而大量使用短橫；為了確保字大而採取

將偏旁寫遠等留白的辦法。另外，隨著筆尖接近手腕，手指的可動範圍變窄，回旋變小，因此推測形成頭重腳輕的字形。

通過比 A、B 簡更大幅度的運筆產生了書寫的節奏，無論橫豎畫，起收筆時都伴隨著細微的回旋節奏的頓、按筆，阻礙了右回旋動作的波磔也隨之消失了。

像這樣，由於書寫範圍的小幅度增加和字體的擴大化，產生了前所未有的速寫方法，被認為是與楷書的產生有關。然而，對於上述第 12 簡中所見的小字楷書，橫畫是水平且扁長的。其中一部分，隨著橫畫的縮短，偏旁之間的空間也會變寬，所以前面看到的楷書是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既定的規則，又或許是利用了字中留白的方式來增加辨識度，因而寫得較小。“蠅頭”的情況，出於上述理由和辨識度的考慮，不論書體，橫畫都是同一角度，並推測為接近於水平的。

此處對東牌樓漢簡以後的楷書附加說明：出於在桌面上紙的書寫，以及紙面、碑面構成法的必要性考慮，（東牌樓漢簡以後的楷書）有經過了像北魏和唐代遺跡那樣被洗鍊的可能性。特別是隨著字的進一步擴大，根據橫畫的仰覆——出於手的構造問題和使字看起來更大的原因——可見在同一個字中橫畫的角度產生的變化。<sup>21</sup>

本部分雖然沒有就紙、器物、筆等工具展開探討，但是從懸縣置殘紙（西漢晚期）的書風考察來看，有必要深入研究簡牘的擴大化、紙的常用中哪一個對楷書的形成有貢獻。另外，還需考慮到毛筆短鋒的變化，<sup>22</sup>但由於出土的案例較少，很難判斷其影響。希望能夠和專業人員一起結合其他途徑進一步考察。

## 結語

本文以漢代隸書碑刻和東牌樓漢簡為研究對象，對書體、書風的變遷進行了

<sup>21</sup> 關於唐楷，其特徵多為“左收右放”。這被認為是為了改變字勢而下的功夫。菅野智明〈教材研究の視點（6）—例外的法則—〉（東書E ネット <https://ten.tokyo-shoseki.co.jp>，2006）對於《九成宮醴泉銘》的結構，左收右放、左放右收都可以確認，另外，由於主要橫幅寫得接近水平，根據其位置的上下，收放的方向會隨之發生變化。

<sup>22</sup> 前揭注 16 橫田恭三《中國古代簡牘のすべて》。

探討。東漢的簡牘通常在較狹窄的區域內書寫，但是隨著在碑面的書丹和寬幅木簡的使用，即書寫對象的擴大化，使得書寫大字的機會增加了。其次，為了應對後起的書寫狀況，通過運用短橫等方式，以實現書寫的省力化。上述的變化，可以認為是產生新書體、書風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通過設定並驗證假說的方法，對古代書跡（本文以東牌樓漢簡以前的簡牘為例）進行考察，探討其為了應對不同的書寫狀況而產生的技法。但在此之後的中國書法歷史，都朝著所謂的明末浪漫派的字大和書風發生了各種各樣的變化。日後將會就新跡書法（與古跡相對），探討其中實行的應對方法。

圍繞字大、書風的相關課題，今後可以考慮從以下這些層面展開研究：同一書家中多種書風共存的原因；解析摹勒工具或者毛筆的變化；從運動學的角度分析手部的細微運動等等，<sup>23</sup>同時這也是與書寫書法教育相關的課題。這關於在日常中使用 A 線（7 毫米）和 B 線（6 毫米）（為了書寫整齊而在紙上標註的間隔線）筆記本的情況下的硬筆指導，和利用宣紙等擴大臨書的意義。

尤其是在擴大臨書時，與歷代書跡書寫狀況不同的情況較多，無法區分上述的古跡、新跡，也有可能無法深入體會。還原當時的工具是有困難的，並且現在來說忠實於形的臨摹也許沒有太大的意義。然而，如果我們的目標是，在大字化、作品化的同時注意到與原作最微小的偏差，那麼就有必要迅速將應對新跡的創作方法理論化。

---

<sup>23</sup> 已有、原章〈書字における母指、示指関節運動解析—ゴニオメータによる測定—〉（《日本臨床バイオメカニクス學會誌》第 15 號，1994）、田口英郎〈書字動作における上肢力學特性の解析〉（《電子情報通信學會論文誌》J80—D—II 第 3 號，1997）、滝本貢悦〈基本點畫の毛筆書字動作における特徴分析—筆圧、握持圧、筆管傾斜角、動画像データからの考察〉（《書寫書道教育研究》第 24 號，2009）等，認為應該根據字大的不同來探討用筆方式。日常書寫小字的情況，雖說與楚簡和西漢簡的狀況相似，但也有必要探討其仿古的用筆方式和目標的書風。如今的我們，對唐楷這樣的書法風格感到知性，但從目前的書法狀況來看，或許應該從這樣的認知中擺脫出來。

## 圖版出典

(圖 1) ~ (圖 3)、(圖 5)、(圖 6) 金石拓本研究會編《漢碑集成》(同朋舍, 1994)

(圖 4) 徐玉立主編《漢碑全集》2 (河南美術出版社, 2006)

(圖 7) 西林昭一責任編集《簡牘名品選》7 (二玄社, 2009)

(圖 8) 西林昭一責任編集《簡牘名品選》6 (二玄社, 2009)

(圖 9) 西林昭一責任編集《簡牘名品選》2 (二玄社, 2009)

## 附記

原載《大學書道研究》第 8 號 (全國大學書道學會、2015), 頁 5-16。在此特別感謝馬亞楠 (中國人民大學 2018 級博士)、黃栩柔 (筑波大學人間綜合科學學術院人間綜合科學研究群藝術學學位プログラム (博士前期課程) 在籍), 對本論翻譯給予了大力協助。

